

面向紅塵的人間佛教—— 翟本瑞《紅塵中建立佛陀志業》讀後

段玉明

四川大學佛教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如果人間佛教的終極目標不僅僅是淨化人生、淨化家庭，還包括了淨化社會、淨化世界，那麼，理論上人間佛教是否能夠淨化社會、淨化世界？實踐上它又是否可以淨化社會、淨化世界？就是兩個必須回答的根本問題。否則，在社會與世界的層面（可以總名之曰「紅塵」），人間佛教就有可能只是一種烏托邦似的想像，乃至僅僅是一種觀念的販賣。就此，翟本瑞教授之《紅塵中建立佛陀志

業——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高雄：佛光文化，2022年11月）大作，以星雲大師的理論與實踐為依持，學術性地回答了這兩個根本問題，而且是迄今為止最系統、最全面且有相當學術深度的回答。

翟著，的成功，首先在於其所選擇的兩個獨特的學術視角：一是比較宗教的視角，由此探析人間佛教是否具有引領傳統社會走入

深受西方宗教影響之現代文明的內在特質；一是著眼於現代社會的視角，由此探析人間佛教是否可以有效地解決深受西方宗教影響之現代文明的內在矛盾。藉此兩個視角，不僅圓滿地回答了人間佛教是否能夠以及可以淨化社會、淨化世界的問題，而且證成了「在全球化格局中，人間佛教更能面對當前世界的挑戰，以及人類的未來命運，甚至人間佛教還能針對西方文化當前困境，提出一些較佳的解決方案」（翟著，頁 41）。

自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發表以後，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便有了一種所謂的因果關係，似乎只有基督新教才可能帶領傳統社會走向現代、才能將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合理化。借其後續對非基督教的宗教研究中，韋伯進一步固化了他的這種認知，尤其是在儒家、佛教與道教影響下的東亞社會中。在他看來，「儒家傳統與佛教文化圈無法自發產生現代資本主義開展所需要的氛圍，道教與佛教遁世的觀念更成為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翟著，頁 73）但事實上，韋伯不僅關於儒家與道教的認識一知半解，其所了解的佛教也只是印度的原始佛教，而對佛教進入中國以後的演變發展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余英時先生在其《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已經詳細地證實了宋元以降的新禪宗、新道教、新儒家催生出了中國近世的宗教倫理，其如勤勞、節儉、誠信、克制等，與韋伯所謂的基督新教倫理如出一轍，故將東亞社會未能很好地融入西方現代社會歸罪於東亞宗教的先天不足，明顯已不成立。而且，伴隨日本的崛起，伴隨「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東亞宗教倫理所具有的當代價值遠遠超出了韋伯的想像。

在此基礎上，擱置儒家與道教，翟著，更詳細地將基督新教與佛教做了類型學的比較：「基督新教是神為中心的、倫理的、現世

的、制欲主義的、特殊主義的；相形之下，佛教則是宇宙中心的、巫術的，出世的、神秘主義的、普遍主義的。」在基礎、手段、領域、方法、體制 5 個向度上，兩種宗教「都處於完全對立的兩端」，不能以基督新教的立場為立場，而應以「不同宗教對於生命與救贖所抱持的態度」為立場（翟著，頁 55-56）。接著，翟著，又將基督新教與佛教教義做了比較，借助對上帝觀與佛身觀、救贖論與解脫觀、愛觀與慈悲觀、榮耀上帝與了生脫死、經典編纂與詮釋幾組立教核心的比勘，揭示出不同價值系統的不可共量，「基督新教和佛教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系統，（都）會對信徒及社會產生關鍵性的引導作用」（翟著，頁 71）。

類似比較，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佛教異質於基督新教的種種特性，無論是在立場上還是價值系統上，都必須「建立屬於自己文化的分析架構」（翟著，頁 78），現成地套用基督新教的分析架構，即必落入韋伯的學術魔咒之中。如果現代文明本身確是基督新教深刻影響的產物，類似比較還為人間佛教的當代介入開闢了新的認知路徑——跳出韋伯式的分析路徑，唯此方可討論人間佛教是否可以解決現代文明內在矛盾的問題。

現代社會建立在成熟的民間社會之上，起自價值理性與形式理性的辯證開展。價值理性以利益為核心，圍繞自利利他形成了一整套現代社會的價值判斷。形式理性以權力為核心，按照權力分散的原則架構了一套整民主、法制、人權的保障機構。兩種理性將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趨於一致，促進了以資本主義社會為核心的現代文明的迅猛發展。然而，隨其主權國家體制、三權分立原則、民主制度等被視為普遍的價值從歐美擴展到全球，西方式的民主共和體制成為主導全球發展的主流體制，「並非所有社會都能平易地移植這

面向紅塵的人間佛教——翟本瑞《紅塵中建立佛陀志業》讀後

套制度而不產生適應上的問題」（翟著，頁 114），乃至在其運行較好的國家也出現了諸多問題，

宗教價值崩解、工具性理性膨脹、只問利益只要合法什麼都可以做、資本家挾龐大資金過度操作自我利益、小市民的價值無從保障，即使三權分立存在一定程度的平衡、媒體第四權也應給予以制衡，但失去價值的操作讓民粹主義抬頭，各種政策為討好選民而走極端，人們開始厭惡政治，開始質疑民主失靈，過半民眾不滿意現有民主體制。（翟著，頁 122-123）

這就是人間佛教登上歷史舞台時的「紅塵」，價值理性不再主導現代社會發展，各個不同領域完全交由形式理性支配。「由於西方文明與其宗教教義原則是同一建構過程，單就西方宗教是無法有效解決其內在矛盾的，因此，當代文明困境也無法依靠西方宗教來進行改革。」於此「現代」背景下，星雲大師重新建構出來的合乎社會需求的人間佛教，「不但符合佛教傳統精神，更能面對全球化的未來，應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最需要的智慧。」（翟著，頁 42）。

星雲大師未出家時已對傳統佛教疏離社會抱有看法，至出家後，畢生致力於佛教的人間佛教改革，以求將佛教落實在人間、落實在生活中，落實在每一個人的心靈上。在〈我推動人間佛教〉一文中，星雲大師將此目標概括為「入世重於出世，生活重於生死，利他重於自利，普濟重於獨修」。其具體的努力與貢獻，翟著，將其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確定了人間佛教信眾的公民立場，這是人間佛教介入社會、改造社會的立足點。人間佛教若欲淨化現代社會即必以菩薩道

之精神、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精神積極介入現代社會。其不同於傳統佛教的，首先即是以公民身分棲身於現代社會的佛教徒應該積極參與到社會政治之中。太虛大師將「政治」定義為管理眾人之事，行菩薩道的人間佛教應該秉持積極參與的態度。佛教本身也是一種社會組織，需要與國家政治保持適當的關係。

怎樣才為「適當」呢？太虛大師提出了「問政不干治」的原則。星雲大師不僅認同太虛大師關於佛教徒應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的主張，而且積極介入社會政治——很早即被稱為「政治和尚」，認為這是在行使民主社會中公民應有的權利及相應的義務，並在相關論說中開展為：（1）就政教關係而言僧人應該問政、（2）公民身分與宗教身分的平衡、（3）僧人擁有並應善用公民權責、（4）普世的公民價值資源、（5）中華文化身分認同 5 個方面，「佛教不能置身公民社會之外，更應積極投入改善社會的行列」（翟著，頁 131）。

星雲大師也認同太虛大師提出的「問政不干治」的原則，「認為這是所有佛教徒都可奉為圭臬的原則，佛教徒放棄治國的權利，但不能放棄關心人民福祉的責任」，號召佛教徒應該多關心國際民生、多關心人民的幸福，「所有人都應尊重佛教徒問政的權利」（翟著，頁 134）。人間佛教



面向紅塵的人間佛教——翟本瑞《紅塵中建立佛陀志業》讀後

信眾雖對政權擁有部分不加討論，但對眾人福祉必須關心，凡是影響到日常生計的眾人之事應不回避、據理力爭，「事涉公民權利，人間佛教的態度反而是積極關懷、認真參與」（翟著，頁 140）。以公民立場積極介入社會、介入政治，是星雲大師之於人間佛教入世精神的基本要求。

（二）把佛教作為一種志業，完成了人間佛教的典範轉移。毫無疑問，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的理論建設貢獻至巨，不僅在其豐富與完整性方面，還在將這些理論生活化、人間化方面，更在將其一一落實的實踐方面，所謂「佛教人間化，人間佛教化，佛法生活



國際佛光會 2014 世界會員代表大會升旗典禮。（莊美昭 / 攝）

化，生活信仰化，信仰理智化」。(星雲大師：〈我推動人間佛教〉) 為此，星雲大師宣導建立了佛光山、國際佛光會作為「佛教社會」的基礎，並在制度、教育、文化、弘法、觀念、儀軌、事業等方面做了面向現代社會、引領現代社會的諸多創新，使傳統佛教轉型成了人間佛教。其近 80 餘年改革創新的具體措施與成就，在翟著中有非常詳細的羅列。翟本瑞教授引入尤納斯模式作為參閱，發現根本無法為佛光山事業體畫出「單獨一張」營運模式圖來，「為了開展佛陀在人間的志業，人間佛教無論在理論、組織建構、實踐活動上，都展開了龐大的工程。星雲大師憑著過人的毅力與卓越領導力，不斷有創意、不斷有新設計，逐步完善佛光教團的人間志業。」(翟著，頁 189)

(三) 把佛教作為一種企業，開釋出了人間佛教的經濟理論。星雲大師雖然謙虛地稱自己不懂管理、不懂行銷，只懂人心，但恰恰是這只懂人心，為人間佛教開釋出了一套切合現代社會的經濟理論。回到佛教的核心價值，星雲大師首先將經濟學中以貨幣為標準來界定的財富，擴大成為對人心、人性足以提供滿足的事務。以此出發，「所有的滿足不再是零和的分配，也不再以爭奪為出發，更不會局限在物質享受，才能真正促成身、心、靈的滿足。」(翟著，頁 198) 其次，星雲大師論述了人間佛教正確的求財與積攢財富的方式，即追逐合乎正業、正命的財富，鼓勵人間佛教信眾多多賺取淨財，同時引導他們追求心靈富有的生活。為此，星雲大師主張將信仰與事業結合，「把佛陀志業當成事業來經營，把佛化人生、佛化生活當成事業來經營，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以入世手段，實踐出世價值，以期能在現世建立『富而好禮的人間淨土』。」

翟本瑞教授認為：「人間佛教『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

完全符合當前全球都在積極推動的『社會企業』之精神。」（翟著，頁 212）借助對傳統經濟學的清埋，翟教授進一步指出：「經濟學對供給與需求的討論，不再只化約到從自利心出發、單單用金錢計算基準的均衡模式，而能擴大到價值提供、意義創造、服務加值，滿足人生最大效用的厚生利用模式。於是，當前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困境，就能藉此得到紓解。」（翟著，頁 219）

（四）以佛教本身的包容性為基礎，建立起了人間佛教龐大的弱連帶關係網路。不同於其他宗教，佛教雖然也有不同教派的分歧，但卻仍然能在佛教的總名（或者佛陀的本懷）之下接受相似的價值系統，相互承認並且各美其美。星雲大師認定現代社會的所有異質因素都可以在佛教眾生平等的思想中得到紓解，「人間佛教得以透過每個人不同關係網絡，將各種弱連帶整合成有系統的社會關係網路，成為提升社會價值最佳的人際關係網路。」（翟著，頁 237）為此，星雲大師提出了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四給」信條，主張以退為進、以和為貴消解社會關係網路中的張力，進而消解同質性社會關係網路中的排他性乃至異質迫害性，並通過佛光山、國際佛光會等實際組織，將全球的佛光山人間佛教信眾連成為一體。翟本瑞教授認為：星雲大師倡行的人間佛教「代表著一種新的現世關懷，重建了新的人際關係並海納異質性的成素，在道德、價值、階級等衝突立場間，尋求新的包容，值得深入探討。」（翟著，頁 233）同時期待著這種弱連帶的社會關係網路，「成為世界不同宗教及社區的結構洞，整合所有資源，共同為世界和平、人類福祉而共同努力。」（翟著，頁 244）

（五）以菩薩道精神為根本，開創了一套可持續的社會服務系統。星雲大師以「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菩提心為出發點，認為

行菩薩道要從修行出發，但修行不只是誦經，更要從服務、發心、苦行出發——「服務就是修行，發心就是修行，苦行就是修行」，將修行與社會服務完美的結合在一起（翟著，頁 260）。通過反思西方福祉國家的建立與失敗，翟本瑞教授認為，星雲大師倡行的人間佛教「從發心服務出發，在義工活動中修行，肯給人、肯服務、肯助人一臂之力，與人結緣，給人歡喜，社會就能更為和樂圓融」，而不再如西方社會那樣只會投入金錢解決社會問題，應是一套可持續的社會服務系統，可以解決現代社會服務的諸多問題（翟著，頁 271）。

（六）以佛陀住世說法為榜樣，將人間佛教推向了五大洲。面對現代社會日益嚴重的宗教衝突與環境惡化，星雲大師堅持人間佛教可以為其解決提供自己的智慧與方案。以佛陀悟道後畢生周遊各國開展弘法活動為激勵，星雲大師畢生均在努力地推動人間佛教的國際化，除台灣地區外，共在全球五大洲創建了 124 個道場，包括亞洲 48 個、美洲 38 個、歐洲 14 個、大洋洲 14 個、非洲 8 個。其所以能夠達此成就，翟本瑞教授引用了星雲大師自己的概括：

是因為人間佛教包含「生活層面」和「精神層面」；也包括「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更兼具「現代特色」與「傳統特色」，人間佛教「現實重於玄談、大眾重於個人、社會重於山林、利他重於自利」，包含社會化、生活化、現代化、大眾化和人情化，人間佛教可以說是人類所需要的佛教，是引導人類走向新世紀的指標。（翟著，頁 297）

翟教授認為：只有深耕國際，人間佛教「才能參與國際事務，才能真正與其他宗教對話、交流、溝通、合作，為全球重大議題，承擔

